

如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HOW TO SOLVE 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

蔡文眉

编者按：这一期里集中编发的几篇关于人口研究的文章，都是作者根据其本人在本刊编辑部于3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的。文章中提出的控制我国人口，加强计划生育的不同方案和措施都是在广泛的实际调查和长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求实性和科学性。这一组文章就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加强计划生育，以及目前人口趋势可能带来的新问题作了深一层次的学术性探讨。我们发表这些文章，意在为解决我国久困不解而又强攻不下的人口难局贡献一些突破性的创见和方案，以期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关注。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都强调了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我国人口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针对当前人口政策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制定人口政策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曲折和失误，一个根本性的教训在于急功近利。而决策上的失误又往往要在若干年后才显现出灾难性的后果。当恶果发现时，已经是难以纠正，甚至是无可挽回了。这一点在人口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今天严峻的人口形势不正是50年代、60年代决策上的失误造成的吗？今天的决策如果再发生失误，若干年后在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上必将出现严重问题，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2. 着眼于“导”还是着眼于“堵”。70年代在人口政策上曾经采取疏导的方针，“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对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明显效果，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稳步下降到1980年的最低点2.2。而进入80年代，采取了“堵”的方针，“一对夫妇一个孩”，先是提倡，后是严格限制，进而农村每年发动四次“生育围堵战役”，十年下来，从效果看，农民对立情绪严重，偷生、抢生、逃生、超生等“抗堵”现象处处可见，百禁不止，总和生育率反倒上升，并一直在2.47上下摆动。从长远看，若对20年前政策失误所形成的强劲的人口增长惯性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对当前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有效，但若干年后在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素质、农村养老等问题上带来的问题又将是灾难性的。由此看来制定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当以“疏导”为上策，搞“围堵”实为下策。

3. 客观求实地对待农民的生育意愿。制定人口政策，当然要强调顾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要从大局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时处当前初级阶段，基于农村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农民在养老、持家等问题上的观念和实际困难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有真正改变的现实情况，对农民必将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希望有一个男孩子的生育意愿不能采取嗤之为封建意识而置之不顾的态度。十年来强制推行现行政策在农村所遭遇到的强大阻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和不安定因素正是无视这一事实致使农民产生各种逆反心理的表现。

4. 制定政策应该有科学的依据,而不能单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意愿和主观臆断。应该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根据实际可能来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科学地确定人口指标,而不应该是反过来,只依据主观意愿,以很大的随意性先确定一个指标,再据此来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否则在执行过程中必定会处处碰壁,步履维艰,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十年来的困局和教训恰在于此。

以上是专家研讨中谈到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都是有道理的,很值得主管人口和计划生育的领导部门深思。

座谈会结束时,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本刊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多年来在人口政策“禁区”内一次难得的、坦诚的学术争鸣会。座谈会上人人认真严肃,畅所欲言,对文章见刊后的影响抱有强烈的期望。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议论人口问题。报刊上以醒目的标题给人口亮了黄牌,提出计划生育的警钟要长鸣,甚至有人诉说生育造成的罪恶等等,归纳起来无非是说人口失控了,人口出现了严重危机。现仅就自己的研究和观察谈谈我的人口观。

一、如何估计当前的人口形势?

近两年人口出生率回升,自然增长率也回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60年代出生高峰期的人口已陆续进入婚龄育龄,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而死亡率从70年代以来,基本上维持在6~9‰的低水平,所以人口总数逐年持续增加。这本应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分惊慌是不必要的,当然也不可掉以轻心。

控制出生人口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国80%的人口在农村,以出生人数为例,1987年农村为1 891万,是城市新出生人口的5倍,减去同年死亡人数,农村净增1 305万人,是城市净增人数的5.2倍。自1985年以来,农村出生人口增加的势头比城市要高得多,如1984年农村增加927万人,是城市的4.95倍,1985年,增加1 025万人,是城市的6.21倍,1986年增加1 247万人,是城市的5.31倍。农村的出生率也高于城市,而且呈上升趋势,如1984年农村出生率为17.9‰,1985年为19.17‰,1986年为21.60‰,1987年为22.01‰,1988年为20.78‰,平均比城市高出4~5‰。从总和生育率来看,1986年农村为2.58,城市为1.29,1987年农村为2.60,城市为1.30,农村比城市高出一倍,特别是三胎及三胎以上的比例更高,因城市居民生二胎的都很少,只有极个别三胎。而农村的二胎极为普遍,三胎也占一定比例,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农村1985年三胎及三胎以上比例(占当年出生总数)为19.75%、1986年为17.27%,像陕西、河南等省的多胎率达25%以上。

二、人口黄牌亮给谁?

很明显,人口黄牌亮不到城市育龄妇女头上。那么,是否亮给农民,特别是农村育龄妇女呢?我们认为也不应该,理由是:我国农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水平了,如1986年为2.58,1987年为2.60。那么,是基层干部(特别是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得力,黄牌该亮给他们?也不然,因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实际上也如此在做)。即使到1984年7号文件传达后,“开小口”的比例也只不过10~20%,而用行政办法,即使一年搞3~4次突击运动,也很难使总和生育率降下去。这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黄牌该亮给人口决策者,因为近几年人口的回升,很大程度上在于忽略了人口惯性作用,过早过快地普遍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决策(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因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住影响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制止与杜绝三胎上,因而只能得到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三、人口政策的决策原则

合乎国情,顺乎民意,是总的决策原则。

1. 瞻前顾后,人口发展切忌大起大伏,切忌短期行为。人口结构形成有一个过程,来龙去脉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到1982年突破10亿大关,30多年,人口翻了一番。今天的育龄妇女是20多年前出生的人口群体,1984年末,我国有育龄妇女2.69亿,1987年末就增加到2.92亿,预计到1990年会增加到3.10亿。抓紧控制出生人口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对人口问题,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

些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国 50 年代到 60 年代, 总和生育率为 5.8~6, 70 年代推行计划生育, 总和生育率迅速降到 2.4 左右。而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来的 80 年代, 总和生育率却徘徊在 2.4 左右 (1981 年为 2.61, 1982 年为 2.86, 1983 年为 2.42, 1984 年为 2.35, 1985 年为 2.20, 1986 年为 2.42, 1987 年为 2.59, 1988 年为 2.31), 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未能瞻前顾后造成的结果。

2. 实事求是。为什么计划生育工作会成为我国今天的一大难题? 归根到底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妇女生育率的制约作用。在大多数农民还是运用简单农具从事体力劳动进行生产的条件下, 要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无论如何是十分困难的。总和生育率能降到 2.4 上下, 再也压不下去的根源亦在于此。都江堰的李冰父子治水, 不是堵截, 而是疏导。我们对人口的控制与发展也必须从实际出发, 进行疏导。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调节生育行为的作用, 但它不可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再好的愿望, 如果脱离实际, 实施的可能性就会大成问题。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大大增加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1980 年的“公开信”是号召党团员带头响应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所谓“提倡”是指某一事物有其优点而尚未被普遍认识时, 由先知者提出倡导以便谆谆善诱地、有计划有步骤地由少数人带头实行, 逐渐形成一种风气。我们的做法却是一下子全面开花。灌输、强加的效果是照办的人不那么多, 而阳奉阴违, 弄虚作假, 顺着领导希望达到的数字往上报的却不少。生育上的两本账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在这样的气氛下, 反馈机制失灵。瞒报出生人数的事屡见不鲜, 据《人民日报》报道, 未报户口的“黑人”已达 800 万。

3. 合情合理。计划生育工作者用算账法想让群众明白, 人多了, 人均耕地面积就减少; 一家多一口人, 人均收入也减少。但群众也在算账, 多一个孩子将来多一个劳动力; 五六岁的孩子就能放牛, 放鹅, 打猪草, 为家庭积累财富出力。在国家还不可能更多投资社会福利事业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农村, 进入老龄后, 绝大多数人还得依靠子女养老。只生一个女儿, 嫁出去了, 谁来帮助养老, 因此一般都希望生一男一女。

中国有偏爱男孩的传统, 当只能生一个时, 性

别选择问题就被人为地突出出来。今年 3 月 4 日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在接受《党建》杂志记者采访时讲, 到目前我国已开始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女的占人口的 48.9%, 男的占 51.1%。这样发展下去, 意味着将来会有几千万娶不上妻子的光棍。这只是讲到总人口中的比例, 严重的问题在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据 1982 年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 全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08.47, 安徽省为 112.45, 河南省为 110.32, 广东省为 110.47, 已经出现失调。近年来的情况未见正式公布数据, 但从我们在几十个县的了解, 问题的严重性有增无减。

4. 多因素综合平衡。生育是一种社会行为, 它受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制约。因此, 光靠计划生育委员会一家来抓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敢于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作为立法, 但不少国家里却有相当一部分人自愿只生一个。可见, 人口问题作为一门科学, 必须用科学态度来研究。如果把育龄妇女都看成对立面, 甚至用经济上搞垮, 生活上搞穷的办法对待, 是很不妥当的。

四、人口难题待求解

人们盼望生育立法, 立了法, 人人就都有了可循可依的“定心丸”了。

我们认为, 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突破口。立法定为两个, 现在如此, 2000 年如此, 3000 年也如此。从理论上讲, 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上, 经过 70 年至 100 年, 人口结构会趋于合理的稳定 (这个问题有专题论证); 从实践看, 群众也能接受, 而且总和生育率会降到 2, 比现在的 2.4 要低, 而不是提高; 基层干部也认为这样才好做工作, 有利于杜绝三胎。

要真正对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作科学研究, 就应实事求是, 不说假话。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先生的科学态度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相信, 北大所具有的民主、科学传统, 将激励我们勇敢攻关。我们北大有责任, 也有实力在人口问题上进行系统论证, 对这个重大社会科学课题做出正确的解答。

本文作者蔡文媚 (Cai Wenmei) 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